

95周年所慶： 史語所居延漢簡整理簡介

高震寰*

本文根據勞榦、邢義田等前賢的研究成果，以及作者親身參與整理的經驗，簡介居延漢簡出土後不同時期的整理與出版過程。首先，簡述居延漢簡自出土後運至北平，後因對日抗戰爆發，輾轉於香港、美國，至1965年乃由史語所遣人提領回臺灣的過程。其次，介述居延漢簡在不同時期的整理過程與成果。包括抗戰時期勞榦僅憑反體照片釋讀的艱難出版，到1998年簡牘整理小組根據紅外線設備出版《居延漢簡補編》，再到2017年整理小組以新式紅外線掃描器重新出版《居延漢簡》一到四冊的經過。最後，說明包括無字簡、與漢簡共出的非漢代文物之整理，以及新資料庫建置的概況。

關鍵詞：居延漢簡 馬衡 勞榦 簡牘整理小組 紅外線掃描

*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

一・前言

史語所的漢簡整理、研究，乃至於研究人員的養成，往往與所藏的居延漢簡的整理活動有關。儘管現在由於秦漢簡牘大量出土，所內相關學者研究範圍均遠超出居延漢簡。同時每位學者也有各自的關懷偏好，僅回顧居延漢簡的整理，很難表現每位研究者的成果與特色。但若要呼應 95 周年所慶來介紹所內的漢簡研究，比起回顧研究人員的成果，以所藏居延漢簡的整理為主軸，串起所內相關研究者，或許仍不失為一種突顯史語所主體性的作法。

眾所周知，居延漢簡是由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，在 1930-31 年於中國西北額濟納河流域所發掘，總數約一萬三千餘枚。當王國維將簡牘與殷墟甲骨、敦煌文書、內閣大庫檔案並列為中國古文獻的四大發現時，居延漢簡尚未出土。¹ 但隨著居延漢簡的發現，其重要性迅速壓過《流沙墜簡》中的數百枚漢晉簡牘，在人們心目中成為近代漢簡發現的代表。

史語所對這批居延漢簡的整理與研究，大致可以粗分為三期。第一期自居延漢簡移到北平後，時任史語所助理員的勞榦在傅斯年主導下加入漢簡整理團隊開始。主要以勞榦先生的整理與研究為中心，最終的代表性成果為《居延漢簡·圖版之部》以及《居延漢簡·考釋之部》。第二期大體自 1988 年，簡牘整理小組成立，重啟居延漢簡整理工作開始。主要以整理小組的邢義田、劉增貴、林素清、蕭璠等先生為中心。最終代表性成果為《居延漢簡補編》。第三期大體自 2012 年，史語所購入新式紅外線掃描器後，邢義田重新組織整理小組，再次啟動整理活動開始。主要以重組後的小組成員邢義田、劉增貴、林素清、顏世鉉、劉欣寧等先生為中心。最終代表性成果為《居延漢簡》(一) 到 (四) 冊。

本文第一與第二期的整理、研究過程，主要根據勞榦與邢義田等先生的研究成果。而第三期的整理與研究，相關介述還較少，同時個人有所參與，可進行一些背景與細節的補充。以下，先借重前賢的研究成果，進行一、二期的簡單回顧，再就個人的參與經驗，進行第三期整理、研究過程的介述。

¹ 王國維，〈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〉，《學衡》45 (1925)：1-13。

二・第一、二期：居延漢簡的整理與完整公佈

(一) 居延漢簡發掘後的流轉過程

首先，借重前賢的研究成果，簡單介紹一下漢簡發掘後，從移到北平，抗戰爆發後運至香港，又運往美國避難，最後送回臺灣的過程。

居延漢簡由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的貝格曼 (Folke Bergman) 發掘後，轟動一時，瑞典方本希望將漢簡移往瑞典研究，後在中國方面的反對下，同意留在中國共同研究。1931年5月初，居延漢簡運到北平圖書館，由北大教授劉復、馬衡代表參與簡牘整理與釋讀，瑞典方則提出由高本漢 (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) 參與。² 不過實際主持整理的是馬衡。由於馬衡整理進度緩慢，引起傅斯年不滿。³ 經胡適、傅斯年與北平圖書館協商，簡牘被移往北京大學。除馬衡外，自1934年10月起，增加了北平圖書館的向達、賀昌群，北大的余遜，以及史語所的勞榦參與整理。⁴ 1936年，傅斯年開始向上海商務印書館接洽漢簡的照相和出版，但馬衡、袁復禮、袁同禮等人對出版方式與條件有異議，與傅斯年關係緊張。

1937年7月蘆溝橋事變爆發，日軍於7月28日佔領北平。考察團理事會幹事沈仲章，在理事徐鴻寶協助下，秘密將簡牘與相關資料運到香港。其後戰局惡化，漢簡先後有運往昆明、馬尼刺以及美國等考慮，最終在傅斯年的指示下，透過胡適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人脈赴美保存。漢簡於1940年8月4日離開香港運往美國，

² 剛開始由高本漢、伯希和 (Paul Eugène Pelliot)、馬衡、劉復共同負責，先進行拍照後，印出四份，各自根據照片考釋文字，有疑義處用通信互相請教。高本漢與伯希和實際上沒有參加整理工作，劉復因兼職多達十四項，無暇顧及漢簡，且1934年突然去世，實際上每天上午到北大文史部研究漢簡者只有馬衡。參沈仲章口述，霍偉記錄，胡綉楓整理，〈搶救「居延漢簡」歷險記〉，《文物天地》4(1986): 33-37。邢義田，〈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居延漢簡整理文件調查記〉，收入氏著，《地不愛寶：漢代的簡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），頁520-578。

³ 馬衡整理的緩慢，或與他釋文時的謹慎有關。邢義田曾提到，馬衡釋文稿的字迹最為工整，非有把握，絕不下筆，竟一無塗改。參邢義田，〈傅斯年、胡適與居延漢簡的運美及返臺〉，收入氏著，《地不愛寶：漢代的簡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），頁390。

⁴ 邢義田〈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居延漢簡整理文件調查記〉指出，馬衡在向、賀、余、勞加入後，似乎只擔任複閱，故在調閱木簡的記錄簿上沒有馬衡調閱原簡的記錄。馬衡與傅斯年關係不睦，而工作的五人中，馬、向、賀較為親近，余、勞為傅斯年安插之人馬。兩夥人不論在釋讀或校定上都各自為政。

高震寰

於 10 月中旬抵達華盛頓中國大使館。漢簡抵美時原只裝五箱，後因國會圖書館要求每件加鎖，在大使館改裝成十四小箱，每箱有鎖。至 10 月 26 日存入美國國會圖書館。漢簡在美期間，高去尋先生訪美時曾至國會圖書館看簡，當時漢簡放在善本室的十四個箱子中，封存完好，未曾開過。⁵ 英國魯惟一 (Michael Loewe) 教授也回憶，他曾在訪問華盛頓期間，至美國國會圖書館企圖參觀漢簡。但圖書館人員不允許以任何理由打開箱子。⁶

至 1957 年 8 月，中研院代院長朱家驥函請駐美大使館與國會圖書館接洽，商議將漢簡運回臺灣事宜，國會圖書館表示「可隨時提取」。但一直要到八年後，中研院才利用紐約萬國博覽會參展古物，及存放在國會圖書館善本書回臺的機會，由史語所技士陳仲玉在 1965 年 10 月 21 日提領漢簡，裝載漢簡的運輸船最終在同年 11 月 23 日抵達臺灣。漢簡返國後，存放在史語所考古館二樓。

隔年 1966 年的 1 月 27-29 日，由監察院、立法院、教育部、經濟部、外交部、中央圖書館、中研院史語所等單位組成的點驗小組開箱點收。其後，由於倉庫條件的限制，除勞榦先生曾一度開封，查視保存情況外，就很少有人進行研究。1987 年，史語所現址完工，漢簡移至文物大樓庫房，典藏至今。⁷

魯惟一先生聲稱他訪臺北中研院期間，有幸得到批准，在研究所人員的陪同下打開箱子研究，並聲稱這名「看守」擅長拼綴明清瓷器，其意見對簡牘綴合工作很有幫助。同時也指出簡牘雖然存放很久，但好像沒什麼損壞。⁸ 基於他自認是「三十幾年來第一次打開」的記述，其研究的地點可能在考古館。

(二) 居延漢簡第一次的整理與出版

如前所述，居延漢簡最早在北平由馬衡、向達、賀昌群、余遜、勞榦等人分工進行釋文。其中余遜與勞榦因分頭作釋文，所釋有不少重複。至抗戰爆發，日軍佔

⁵ 邢義田，〈傅斯年、胡適與居延漢簡的運美及返臺〉，頁 389-424。

⁶ 魯惟一先生回憶稱時間大約在 1970 年前後，由於居延漢簡在 1965 年就歸還，因此時間當在 1965 年以前。

⁷ 邢義田，〈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整理工作簡報 (1988-1993)〉，收入氏著，《地不愛寶：漢代的簡牘》，頁 446-477。

⁸ 魯惟一，〈居延漢簡研究的早期階段〉，《出土文獻》第二輯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1），頁 234-238。

領北平，勞榦從南京輾轉到後方，釋文底稿留在北平，釋文的工作只好重新進行。⁹

勞榦 1940 年在雲南昆明開始重做釋文時，原簡尚在香港。當時在香港由沈仲章主持，拍出反體照片後，一份寄到上海製版，一份寄到昆明給勞榦做釋文。後來勞先生到了四川李莊後，釋文才做好。¹⁰ 至 1943 年，勞榦根據了新釋文出版《居延漢簡考釋·釋文之部》。1944 年又出版了《居延漢簡考釋·考證之部》。到了 1957 年出版《居延漢簡·圖版之部》，終於將 1940 年在香港照出的照片發表。1960 年出版了《居延漢簡·考釋之部》，對釋文和考證有補充與修正。至此，勞榦對居延漢簡的整理工作大致告一段落，居延漢簡的釋文與圖版都得到了正式的出版，其考釋也為居延漢簡的研究奠定基礎。¹¹ 不過，由於圖版與研究主要是根據照片，沒能核對原簡，因此仍有一些簡牘沒有被發表，同時也存在許多簡號錯誤與圖版缺失的問題。這促使了其後整理小組以《居延漢簡補編》為成果的再整理。

史語所簡牘整理小組組成的契機，是 1987 年漢簡轉入文物大樓庫房時，考古組何世坤、曹淑惠清點時發現有若干不曾正式發表的漢簡。他們將這些漢簡拍照後，呈予管東貴所長。另一方面，邢義田在 1983-1985 年間，因讀勞榦《漢晉西陲木簡新考》，也興起了重讀居延簡的念頭。並在 1987 年到倉庫考察漢簡時，發現許多照片不如原簡，而原簡已經有褪色跡象，感到有必要重新攝影，於是找劉增貴合作。管東貴所長聞知後，亦告知有若干未發表簡的照片，希望他們整理。於是在管所長的支持下，組成了漢簡小組，最初成員有劉增貴、廖伯源、蕭璠、邢義田。初步清查了未發表簡 600 枚，並進行已發表簡的檢查與校釋。

至 1989 年，整理小組重組，成員改為蕭璠、邢義田、林素清、劉增貴，繼續整理未發表簡與重校已發表簡的工作。該年底日本大庭脩教授來訪，提到了紅外線攝影與電腦技術的應用，引起了小組的興趣。於是在管所長的大力支持下，購得了紅外線設備，辨識出大量因字跡褪色或發黑而無法辨認的字跡，甚至有若干原本認為無字的簡，也在紅外線攝影下發現有字跡。最終清理出未發表簡 4,043 件，除去

⁹ 余、勞在北平的釋文，據馬先醒的研究，兩人原稿交給北京大學，而自留一底本，即曬藍本漢簡釋文。但邢義田指出，勞榦自謂在昆明時手邊無曬藍本可參考，可能並未攜帶曬藍本到昆明。但曬藍本後來不知為何又出現在史語所，其中過程不明。

¹⁰ 勞榦，〈居延漢簡圖版之部序〉，《居延漢簡·圖版之部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57），頁 1-11。

¹¹ 邢義田，〈行役尚未已，日暮居延城——勞榦先生的漢簡因緣〉，收入氏著，《地不愛寶：漢代的簡牘》，頁 351-388。

高震寰

無字以及過於殘缺，以致紅外線都看不清者，初步決定發表 1,097 枚。這些整理工作，最終在 1998 年發表為《居延漢簡補編》。¹²

到此，居延漢簡的圖版與釋文基本完整出版。不過，應該提到的是，儘管居延漢簡被歸還至臺北，中國學術界並沒有放棄對居延漢簡的研究。其成果也迅速成為勞榦《居延漢簡·考釋之部》在學術市場上的有力競爭者。中國科學考古研究所於 1959 年出版了《居延漢簡甲編》，透過拼湊各種資料，收錄了居延漢簡約四分之一的圖版。其後又於 1980 年補充資料，參考了馬衡、賀昌群在北京的釋文資料，出版了《居延漢簡甲乙編》。¹³ 並且於 1987 年又由謝桂華、李均明等簡牘專家出版了《居延漢簡釋文合校》。相對於勞榦因工作時的條件限制，圖版編次較為混亂的問題，《居延漢簡甲乙編》盡可能地按照簡號編排，且附有包號出土地的訊息。這些出版物迅速成為研究居延漢簡釋文的重要參考書。據魯惟一先生的回憶，他於 1960 年參與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居延漢簡研讀班時，研讀班就同時參考勞榦的《居延漢簡·圖版之部》、《居延漢簡·考釋之部》，以及當時出版不久的《居延漢簡甲編》。¹⁴

除了針對居延漢簡的釋文研究外，中國也積極地在發現居延漢簡的居延烽燧沿線發掘新史料。甘肅的文物部門自 1972 年以來，對居延沿線遺址進行了 5 次考察，並將除了肩水金關以外的新發現於 1994 年出版為《居延新簡》。至於肩水金關新發現的萬餘枚漢簡，因數量較多，遲至 2011 年才逐次出版為《肩水金關漢簡》1-5 冊。這些在同一地點新發掘的西北簡牘，成為研究居延漢簡時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考。

另一方面，就在整理小組啟動《補編》的整理後不久，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於 1990 年出版，內容包括了〈語書〉、〈秦律十八種〉、〈法律答問〉、〈日書〉等前所未見的豐富內容，震動了秦漢史學界。1997 年，同樣含有秦代法律的《雲夢龍崗秦簡》出版。而就在《居延漢簡補編》出版後不久的 2001 年，內容包括〈二年律

¹² 參邢義田，〈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整理工作簡報（1988-1993）〉，頁 450-452。邢義田，〈《居延漢簡補編》序〉，收入氏著，《地不愛寶：漢代的簡牘》，頁 471-477。

¹³ 邢義田指出，馬衡、賀昌群、向達等因對傅斯年介入漢簡整理心懷芥蒂，不少釋文稿留在自己手上。1937 年漢簡南下時，有 4,800 張釋文簽還在馬衡手中，賀昌群的釋文稿也完全留在自己手中。這些留在北京的釋文稿，後來成為《居延漢簡甲乙編》編輯時的重要參考。參邢義田，〈香港大學馮平山國書館藏居延漢簡整理文件調查記〉，頁 558。

¹⁴ 魯惟一，〈居延漢簡研究的早期階段〉，頁 235。

令》與〈奏讞書〉的《張家山漢墓竹簡（二四七號墓）》也出版。這些墓葬簡牘不像西北漢簡那般散亂無章，經過初步的整理後，大多數內容可以連讀無礙，迅速吸引了學界的研究目光。就在《補編》出版的 2000 年前後，隨著各式秦漢簡牘的大量發掘與出版，秦漢簡牘研究的學術形勢正在急遽變化。

三・第三期：整理小組對居延漢簡的再整理與出版

《居延漢簡・圖版之部》所收錄居延漢簡 1940 年的老照片，由於年代過於久遠，自出版以來就一直有過於模糊，以及部分簡號錯亂等問題，導致學界研究上的困難。故整理小組自 1990 年以來，已重新拍攝彩色及紅外線照片，並全面校讀過去已出版簡牘的釋文，準備出版居延漢簡的完整圖版及釋文。

這項工作 2003 年時已大體完成。然而由於當時紅外線攝影機的解析度僅有 75dpi，也缺乏後製軟體，僅能手工剪裁，圖像品質未能讓人滿意。而隨著張家山漢簡等新史料的出版，更加清晰的紅外線照片，也使學界對簡牘出版品應有品質的標準逐漸提高。故即便是整理小組 1990 年代攝製的紅外線照片，也逐漸顯得過時。如果居延漢簡重新出版的水準，竟然不及張家山漢簡等新史料，那無疑會讓學界大失所望。同時對於中國學界出版的《居延漢簡甲乙編》以及《居延漢簡釋文合校》，與日本學界的綴合、集成、編聯復原等成果，也理應有所回應。在體認到第三次的拍攝與整理的必要性後，整理小組擱置了原先的出版計畫，各自投入新史料的研究，同時觀察學界的研究、出版動向，等待再次整理與出版的時機。

第三期的再次整理與研究，嚴格來說要到 2012 年史語所購入最新紅外線掃描器後才展開。不過，就培訓研究者與助理來說，簡牘整理小組成員的教學，以及所帶領的讀書會起了很大的奠基作用。其中，以邢義田在 2005 年 3 月左右成立的簡牘讀書會（現名四分溪讀書會）的影響最大。於第三期整理加入簡牘整理小組的劉欣寧，以及在整理中負責掃描、舊釋文整理、新釋文記錄等庶務的高震寰、石昇烜等助理，都受該讀書會的長期訓練。由此著眼，從 2000 年前後到 2012 年，或可視為新史料的研究，及人才的培訓時期。

讀書會最初是邢義田在教學之餘，為帶領有興趣的同學一起讀張家山漢墓竹簡中的《二年律令》與《奏讞書》而組成。當時參與成員以臺大的研究生為主。如前節所提到，張家山漢簡《二年律令》是繼睡虎地秦簡之後，再次有大量、成篇的

高震寰

出土律令，受到學界的極大關注。對於新時代的秦漢史學者與研究生來說，如何認識並研究這些新史料，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。要想迅速地進入漢代法律與社會的世界，睡虎地秦簡或張家山漢簡，確實是比居延漢簡更好的選項。個人在 2009 年加入時，讀書會已經進行了很長時間，當時採用的讀本是 2007 年，由彭浩等主編的《二年律令與奏讞書》。

讀書會是以輪流帶讀的形式進行，且不僅是老師與資深成員，即便是資淺的碩士生也會排入帶讀。帶讀的內容包括對圖版的測量、簡身有無編繩、刻齒等蛛絲馬跡的觀察，以及對簡文內容的逐字釋讀，最後才斷句與解釋。每一個帶讀階段，參與成員都可以隨時提出質疑或發問。儘管帶讀報告的要求不少，但不同於要打分數的課堂，讀書會在輕鬆活潑的氣氛中進行。學生因欠缺經驗，難免對釋文理解有誤，邢義田也都耐心提示，並時常拋出問題，引導學生進一步考察。這讓許多學生透過撰寫報告與帶讀的機會，逐步熟悉了秦漢簡牘的各種背景知識。而經過討論後的諸譯注稿，最後由時為臺大博士生的游逸飛整合，發表在復刊的《史原》上。

另一方面，讀書會也因邢義田的人脈，不時請得一些來訪的外國學者演講，演講的內容不一定和〈二年律令〉相關，也可能是居延漢簡或者新發表的其他簡牘，甚至是考古成果之研究。邢義田因在臺大藝術史研究所開設漢代畫像石課程，也一度成立漢畫讀書會，帶讀圖像研究相關的著述，甚至率領學生到中國進行田野考察。這讓學生除了讀〈二年律令〉外，也能開拓對其他秦漢考古材料的視野。事實上，在探討張家山漢簡的過程中，邢義田深知新時代的研究者不能只熟悉一種材料，常常提示學生居延漢簡、睡虎地秦簡，乃至於唐律等資料的重要性，要求學生參考相關論著，或研究相關課題。可以說雖然以張家山漢簡為出發點，實際上卻因解讀的需要，廣泛地閱讀大多數秦漢簡牘，建立全盤的視野。

在此訓練下，參與讀書會的學生們逐漸掌握了設計學術問題的技巧，先後培養出獨立研究的能力。其中以張家山漢簡為主的代表性成果，有劉欣寧《由張家山漢簡〈二年律令〉論漢初的繼承制度》、洪尚毅《張家山漢簡〈二年律令〉與邊塞漢簡所見漢代的塞尉與城尉》。也有綜合張家山漢簡、睡虎地秦簡等資料進行專題考察者，如游逸飛的〈說「繫城旦春」——秦漢刑期制度補論〉。甚至有若干投入居延漢簡相關研究的成果，例如高震寰，〈試論西北漢簡文書與現實的差距及其意義〉，以及石昇烜，〈何處是居延？——居延城建置反映的漢代河西經營進程〉等。這些研究雖然乍看不一定與張家山漢簡有關，但實際上都受讀書會的啟發。

對整理來說，或許更重要的是，透過讀書會上根據圖版逐字釋讀，以及觀察編繩、刻齒等現象的經驗，研究者與學生們都感受到圖版在簡牘研究中的重要性，並對既有圖版的優缺有深度體會。這些經驗累積，對 2012 年的整理都有很大的助益。¹⁵

2011 年起，中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利用新式紅外線掃描器，陸續出版肩水金關漢簡的高解析度紅外線照片。由於肩水金關就是居延漢簡諸多出土點之一，這次的出版給了整理小組一定的啟發。既然現有的條件已經可以出版非常清楚的簡牘紅外線照片，再次整理的時機似乎已經成熟了。2012 年，邢義田打聽到武漢大學等大陸學術機構購入新款紅外線掃描器 (iMeasure IR-6000)，利用於簡牘的效果十分理想。在所方及考古學門的支持之下，史語所也購入此一設備，展開居延漢簡掃描工作。相較於照相機，掃描器的優點是不需專業技術，圖像不易變形，缺點則是僅適用平面物件，立體、彎曲、凹凸不平的簡牘不易呈現且難以對焦。由於居延漢簡大多數為平面，掃描器符合需求。對於少數非平面簡牘，採取分段多次掃描的方式來克服難題。

此台掃描器之解析度最高可達 2400dpi，儘管當前出版不需如此規格，邢先生考量這可能是最後一次攝製居延漢簡照片，為避免重蹈過去忽略科技進展速度的覆轍，決定以最高規格 2400dpi 進行掃描。此一決定導致工作速度甚為緩慢，由於掃描器的版面有限，每次往往只能放四、五支簡。掃描一次視對象的體積大小與多寡，短需五、六分鐘，長至二十分鐘不等。每枚簡牘最少須掃描正、背兩面，立體、彎曲、大型、有特殊形制的簡牘需要掃描多面、多次。掃描工作主要由時為博士生的高震寰、石昇烜進行。工作人員一邊掃描，一邊也測量尺寸、重量，登錄於資料庫。

對於特殊形制的簡牘，除了由所內工作人員進行特別掃描與拍照外，還與奈良文化財研究所進行技術合作，由專業攝影人員兩度來臺拍攝。盡力提供讀者多面、多角度、局部放大、彩色照片等資訊。至於現況已不若以往，發生劣化、破碎情形之簡牘，則從過去歷次拍攝照片中尋找最佳者以作為補充。並在清查過程修正了過去簡號錯誤、簡號重覆等問題。同時還收錄其他機構收藏之居延漢簡。又每冊最後附上「簡牘文物形制與出土地資料表」，列出長、寬、重、出土地的資訊，也註記

¹⁵ 關於四分溪讀書會起始與發展的詳細情況，可參劉欣寧、游逸飛，〈四分溪簡牘讀書會〉，《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》10(2011)：29-31。石昇烜，〈四分溪里耶秦簡讀書會簡介〉，《早期中國史研究》10.2 (2018)：189-195。

高震寰

燒痕、穿孔、硃筆、封泥匣、刻齒、竹、帛等形制或材質特徵，提供研究者參考。

2013年3月，基於已累積了一定量的紅外線照片，邢義田先生重新召集簡牘整理小組展開工作。這次成員除原班人馬劉增貴、林素清、顏世鉉之外，也加入劉欣寧，以及黃儒宣、高震寰、石昇烜。小組每周開會一天，逐一閱覽新攝製的高解析度紅外線照片，針對每一枚簡牘判斷有無文字、應收錄哪些照片等。接著，根據整理小組2003年已完成但未曾公開之釋文，對照紅外線照片逐字校讀，擬定全新版本的釋文。自1957年《居延漢簡·圖版之部》公布以來，學術界已有不少改釋意見，對《居延漢簡甲乙編》、《居延漢簡釋文合校》等成果，這次整理時盡可能充分吸收。整理過程中有不少海內外專家來訪，也給予頗多工作流程或釋讀、出版上的實用建議。

小組成員中，邢義田、劉增貴先生積累數十年的功力，對於漢簡的字形、書寫習慣、詞彙以及漢代制度、典籍、文化均如數家珍；林素清、顏世鉉兩位先生是長期研究戰國秦漢文字、文獻的專家；年輕學者則對新材料、新研究成果較為熟悉，也擅長利用電腦技術、網路資源等。不同背景、專長、世代的成員每周聚會，一邊參考學界成果、查找字典及詞例，一邊共同腦力激盪，討論各種可能性，再以共識決定較穩當的釋讀。這個過程耗費大量時間，卻能確保釋讀的品質。同時也給予參與整理的年輕成員接觸簡牘實物的機會，以及熟悉居延漢簡文例、研究成果的訓練。

2014年至2017年，《居延漢簡》一至四冊順利出版，收錄居延漢簡中所有有字簡牘、帛書，以及史語所收藏其他漢代簡牘。此外，有些與史語所藏居延漢簡同批出土的簡牘早期即因故流散，現由其他海內外機構典藏，小組也盡力聯繫，取得圖版收錄於此次出版品中。至此，居延漢簡有字簡牘全數依簡號排序，以高解析紅外線照片完整公開。

在出版之餘，整理工作也刺激了小組成員綴合，以及簡冊復原方面的成果。自第一代簡牘整理小組以來，小組在釋讀過程中即不斷發現可綴合簡牘，助理人員在掃描時也多有斬獲。小組在會議中共同決定綴合成立與否，判斷標準包括筆畫、木紋是否接續，筆跡是否一致，長寬厚度、材質是否相符，斷面是否相合等，放大高解析度照片觀察木頭紋理及筆畫細節有時亦極有幫助。截至目前為止，小組成員、助理人員已成功綴合近300組，其他學界同道也綴合30餘組。其中尤以顏世鉉及石昇烜綴合成果最豐，也糾正不少過去綴合的錯誤之處。

這次的整理工作也刺激了一些個別研究成果。顏世鉉基於綴合居延漢簡的心得，與同樣擅長綴合的姚磊聯繫，開始研究金關漢簡等其他居延漢簡綴合的可能性。其成果部分發表為〈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十二組〉。高震寰因整理時接觸並掃描原簡，興起了以新紅外線照片整理簡冊復原的想法。他地毯式地檢討 40 組冊書復原成果，藉由內容、筆跡、格式、日期等判斷原屬同一冊書的可能性，並綜合各種性質冊書最新的成果，以及整理小組最新的綴合成果，進行相關考證。經過約兩年的整理後，最終發表〈居延漢簡簡冊復原成果整理〉(上)(下)。石昇烜則在掃描過程中，觀察到某些簡牘側面有墨線，因簡牘圖版僅公布正面及背面，過去未曾有人注意。他認為這些畫在側面墨線應是作為分欄書寫的標尺，可能在持簡書寫時，使同一冊書簡牘能有一致的書寫位置，達到整齊美觀的效用。其成果最終發表為〈再探簡牘編聯、書寫姿勢與習慣——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的簡側墨線為線索〉。此外，他還觀察到居延漢簡的 65.9 與 65.10 是用於「合符」的一組出入關符，並在此發現的基礎上重新檢驗漢代出入關符的制度，成果發表為〈再論漢代出入關符的製作、左右與使用——從居延漢簡 65.9、65.10 合符談起〉。

《居延漢簡》一至四冊重新出版，引起了學界的廣泛迴響。中國與日本學界都對圖版的精美表示讚賞，並就整理小組的釋文提出了諸多商討意見。對於這些釋文的指教，整理小組都盡可能地參酌吸收，並反映在其後的勘誤表中。小組成員劉增貴更是在討論後，自己又將《居延漢簡》重新閱讀了一遍，提出了若干討論時未被接受的釋字之可能性，以及之前未注意到的新證。最終集結為〈《居延漢簡》釋文補正〉。這些熱烈的學術討論，證明了此次整理的功效，使居延漢簡這批老材料，以符合當前學術需求的樣貌，再次回到研究者的視野中。

四・現況與展望

在居延漢簡的再整理工作告一段落後，簡牘整理小組的主要成員邢義田、劉增貴、林素清等人因屆齡陸續退休。剩餘的工作，由仍在所服務的顏世鉉、劉欣寧，以及曾參與整理工作，後來進入史語所服務的黃儒宣、高震寰、石昇烜共同接手。

所謂剩餘的工作，包括無字簡、共出器物的發表，以及資料庫的建置，和釋文整理等相關研究的深化。儘管居延漢簡的有字簡牘已全數發表，但尚有若干無字簡牘，以及不同時代的共出遺物，可反映古代的物質文化與社會生活，甚至與簡牘內

高震寰

容可能相互呼應，現正進行整理中。無字簡的部分已經挑出較完整，或具有形制意義者，未來將會出版。至於大量過於殘碎，看不出形制意義的無字簡，規劃於資料庫網站公開。

在形制以外，這些無字簡能否提供西北漢簡材質方面的進一步資訊，也是目前嘗試的重點之一。過往木材的鑑識，大多倚賴研究人員本身的經驗，確認為當地幾個樹種，例如胡楊或紅柳。但這些老經驗的判斷，並沒有科學程序來證明。整理小組希望能就無字簡的樹種進行科學性的分析，以確認居延漢簡使用木材的種類是否真的只有過去認知的胡楊、紅柳、竹等數種。初步已經請專家訓練所內人員以肉眼進行初步辨識，但肉眼辨識有其極限，只能初步辨識出是闊葉或針葉木材，未來也希望借重專家與儀器進行科學分析。目前正與植物專家洽談，請其協助分析簡牘樹種，以及判斷簡牘是利用樹木的哪一部分、如何製作等課題。

此外，與簡牘共出了一些織品，其材質、技術、用途等也是研究當時社會生活的重要材料，並可能可與簡牘上的內容相呼應，整理小組也正請專家協助鑑定中。但由於部分鑑定的費用較高，同時各樹種分析專家的資料庫不一定有中國西北的樣本，未來能做到什麼程度，要視具體情況決定。

至於共出文物方面，由於貝格曼採集的文物，有不少不是漢代，而是魏晉、唐、西夏、元代等時期的遺物，超出了整理小組的專業範疇。故各遺物均個別請託國內相關專家辨識與研究。但因為各專家多不在所內，也有自己的研究要忙，研究往往超過商定的期限，在掌握進度上較為困難。再加上行政作業等程序，或許還需要數年時間。

除了館藏的共出文物外，還有一些貝格曼與漢簡一同採集的文物散在各學術單位。已知者包括瑞典的斯文赫定基金會，香港中文大學，中國國家博物館、深圳博物館、故宮博物院等處。整理小組希望持續與這些機構聯繫，請其協助找出相關資料，以拼湊出居延漢簡出土狀況更完整的圖像。例如與居延漢簡共出的部分文物 30 年代被送往瑞典研究，瑞典斯文赫定基金會 (The Sven Hedin Foundation) 表示 1950 年代已送還中國國家博物館，中國國家博物館卻表示找不到這批文物。這批文物現存何處還有待釐清。

資料庫方面，劉欣寧與所內副研究員陳淑君合作，開始重新建置電子資料庫的工作。其成果為「簡牘字典——史語所藏居延漢簡資料庫」，基於資料開放、資源共享的世界趨勢，以國際圖像互通架構 (International Image Interoperability

Framework, IIIF)、鏈結開放資料 (Linked Open Data, LOD) 規範建置，所有圖檔均以創用 CC 姓名標示—非商業性—禁止改作 3.0 臺灣 (CC BY-NC-ND 3.0 TW) 標準釋出。內容包括了釋文、簡號、材料、形制、出土地、時代、尺寸與圖像檢索，甚至有比較清單等功能，希望提供學界更便捷的研究工具。目前收錄大部分已出版簡牘後設資料及圖檔，未來可能還會追加無字簡等內容。

該簡牘字典還與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、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等機構的資料庫合作，建立「歷史文字資料庫統合檢索系統」。透過此系統，可以同時檢索各資料庫收錄的漢字字形，對於掌握漢字字形的時空演變極為有用。除了臺灣和日本的學術機構，目前也有其他國家的學術機構有意合作，如德國海德堡大學科學研究院的北中國佛教石刻計畫 (Buddhist Stone Inscriptions in Northern China) 即有意加入。將來更多機構加入，聯合檢索的範圍更擴大之後，必能對研究東亞漢字文化提供重要貢獻。

在資料庫的基礎之上，劉欣寧還計畫發展數位工具，協助未來的文字釋讀與簡冊復原。藉由現有的資料庫訓練數位文字模型，此後在釋讀時，便不需要倚靠人工盲目查找，而可以藉由 AI 迅速提供可能的字例與文例。這些最新科技的發展逐步成熟後，將可提供學界未來研究簡牘的便利。

釋文方面，如前所述，《居延漢簡》在出版後引發了各界諸多學者對釋文的迴響。整理小組雖然盡可能地參酌修改，但許多字因過殘，經多次開會反覆討論後，仍難以定奪，最後多採保守意見不釋。這些字中，某些在新技術與新材料提出的新證支援下，有可能再度被認可。又如前引劉增貴〈《居延漢簡》釋文補正〉也提出了若干新的釋字意見。又考慮到再度出版的《居延漢簡》部頭太大，或許不適合一般研究者與學生參考，目前初步規劃，可能會再就釋文內容開會，出版一本綜合各界意見的釋文本。

最後，也簡介作為史語所漢簡人才培訓搖籃的四分溪讀書會的近況。作為讀書會中心的邢義田，於 2017 年退休。讀書會在約莫與邢義田退休同時，結束了對張家山漢簡《二年律令》與《奏讞書》的研讀，完成了最初的使命。在邢義田退休後，讀書會由劉欣寧、游逸飛、高震寰等原有成員接手主持。有部分原成員如劉曉芸、石昇烜、黃怡君、林益德等目前仍持續參加。另一方面，由於劉欣寧在臺大，以及游逸飛在中興大學的教學，讀書會也加入了若干臺大與中興的研究生。讀書會的目標，除了讓研究者交流對新史料的心得外，也希望有持續培訓研究人才，以支援各

高震寰

項研究、整理工作的功能。

目前讀書會研讀的對象，是最新出版的五一廣場東漢簡。帶讀的要求基本與讀張家山漢簡時一致。但除此之外，由於劉欣寧的提議，讀書會在帶讀之外，又增設了一個「自選」階段。該階段緊接在帶讀之後進行，由一位成員選讀自己最近感興趣，想和大家一起討論的史料或文章，或者自己最近在研究的課題，以集思廣益獲取靈感。如同過去四分溪讀書會常請不同研究領域的學者來講演那般，自選時各成員選讀的不同課題，提供了讀書會成員拓展研究視野的機會，也使報告者有了一個在草成論文後，向各方專家吸收修改意見的平台。

還值得一提的是，由於疫情關係，讀書會在過去幾年由原本的實體轉向線上。2023 年由於韓國金秉駿教授來訪，聽聞了四分溪讀書會在線上開設，提出了讓韓國首爾大學稷下讀書會的師生一同與會的想法。為此讀書會在 2023 年 5 月 20 舉辦了「稷下書堂——四分溪簡牘讀書會：交錯的中國上古史：臺灣、韓國青年學者交流會」，邀請臺灣與韓國方面各派一至兩位研究生報告與交流切磋。此後，韓國稷下讀書會的師生便持續線上參與四分溪讀書會。基於首爾大學是韓國秦漢史研究的重要機構，而金秉駿教授的學生眾多，這應該能夠在未來，為臺、韓進一步學術合作提供機會。

隨著各式秦漢簡牘的大量出版，秦漢簡牘研究進入細密分工的階段。基於不同研究興趣，研究不同性質簡牘的學者，可能對彼此的研究領域與史料都不見得熟悉。相對於民初王國維《殷周制度論》那樣企圖總結整個時代的大作，今日的簡牘研究在高度專業化的同時，不免予人一種學術碎片化的印象。不過，出土史料的內容包羅萬象，已經不是一個學者能單獨掌握。同時，僅從某個領域切入的視角，也很難展現真實歷史的多樣與多面性。從不同領域切入，深入細緻的專題研究終究有其必要。歷史學者不太可能放棄對整體歷史的系統性追求，但以多位專家合作的形式，或許更適合需要精密分工的現代學術環境。

我相信多數歷史學者，都有超出其專題論文的關懷。目前各領域必須以高度專業化來解決的新問題，很多出自新史料在解讀上的疑難。一旦那些問題在專題研究的累積中得到一定解決，對「歷史與現今如何聯繫」的共同關懷，仍會促成不同領域學者們基於宏觀歷史興趣的交流與對話。在那樣的條件成熟前，我以為將從史料整理等基礎工作打穩，也是歷史學家的重要任務；居延漢簡的整理便是這樣的工作。從前人在戰亂環境下的輞路藍縷，到基於最新科技與團隊合作的重新出版，持

95周年所慶：史語所居延漢簡整理簡介

續引領學術趨勢，更新向學界與公眾呈現的方式。如是過程，某種角度上也是史語所的縮影。謹此向史語所九十五年來的學術工作致敬，同時也預祝史語所未來也持續地為人類的學術探索做出貢獻。

高震寰

引用書目

王國維

- 1925 〈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〉，《學衡》45：1-13。

石昇烜

- 2018 〈四分溪里耶秦簡讀書會簡介〉，《早期中國史研究》10.2：189-195。

沈仲章口述，霍偉記錄，胡綉楓整理

- 1986 〈搶救「居延漢簡」歷險記〉，《文物天地》4：33-37。

邢義田

- 2011a 〈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整理工作簡報（1988-1993）〉，收入氏著，《地不愛寶：漢代的簡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頁446-477。

- 2011b 〈行役尚未已，日暮居延城——勞榦先生的漢簡因緣〉，收入氏著，《地不愛寶：漢代的簡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頁351-388。

- 2011c 〈香港大學馮平山國書館藏居延漢簡整理文件調查記〉，收入氏著，《地不愛寶：漢代的簡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頁520-578。

- 2011d 〈傅斯年、胡適與居延漢簡的運美及返臺〉，收入氏著，《地不愛寶：漢代的簡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頁389-424。

勞榦

- 1957 〈居延漢簡圖版之部序〉，《居延漢簡·圖版之部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頁1-11。

劉欣寧、游逸飛

- 2011 〈四分溪簡牘讀書會〉，《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》10：29-31。

魯惟一

- 2011 〈居延漢簡研究的早期階段〉，《出土文獻》第2輯，上海：中西書局，頁234-238。